

智能媒介视域下传播学研究的范式流变

—
徐
轶
璞

那
宇
奇

—

【内容摘要】 传播学研究范式作为该学科认识自身与面对现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凝结了既往学者们对于某些特定问题的共同看法,呈现出“重主体、轻客体”“重符号、轻物质”“重精神、轻身体”的二元哲学取向与一维时空观念。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创设出巨量化、圈层化、场景化的传播环境,使得既往传播系统的视角将难以继续框定媒介普遍现象。以具身性、经验性、互动性作为范式转化的落脚点,结合智能媒介的发展特点,从传播学历史框架呈现出的范式取向讨论中,归纳并探究智媒究竟从何种角度改变了如今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条件,形塑出主体、信息、技术、场域以及关系这“五要素”所建构的新媒介系统。思考传播学未来的研究范式应具备的趋势与特点,从而理解智媒如何重塑现实、人类以及这两者间的关系。

【关键词】 智能媒介;媒介系统;范式

DOI:10.19997/j.cnki.xdcb.2023.08.005

媒介建构论认为“现实”(reality)是媒介参与者在其互动过程中建构而成的。客体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为人们所指涉,媒介因此具有自我生产与自我扬弃的功用,现实也被划归为在社会系统之内经由意义生产(sense-making)的形式而诞生的一种关联物。从Web1.0至今,我们被推进移动化、自主化、智能化的传播逻辑中,接受着来自技术的不断叩问和质询,并在其中形成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识。不同于既往的线性传播,智媒时代创设了巨量化、圈层化、场景化的传播环境,并将这种影响映射进每一个己身的当下。跃进式发展的传播环境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有理论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与新环境伴生而来的诸多现象,层出不穷的多样化研究间却树立起更高的理论壁垒,割裂的理论发生缺乏同一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寻求新的进路与可能。

智媒时代传播学学科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成为了本文现实建构的切入点。本文计划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即探讨历史框架中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及其生成路径,从大众媒体时代的研究范式说起,在超越实

证与批判的对垒中,辨析其可能的未来;归纳并探究智媒环境究竟从何种角度、何种程度改变了如今的传播环境与传播条件,从而为可能出现的新的研究范式奠定了何种基础;阐释传播学未来的研究范式应具备的趋势与特点,即思考学界将要转换的方向与路径。

一、思考从何开始——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

范式作为一个学科如何认识自身与面对现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自理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影响理论的价值取向,其与理论相伴相生,并不断回环着以进行理论统摄与分化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认为技术作为一种核心的驱动力量,将在每五六年引发一次范式的变迁,从技术涉及的有限范围推及至全人类,并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深层次的结构性影响。传播学传统研究范式多从人的内部关系出发,致力于解答主体如何用符号达成精神诉求与意义流动,少有将目光聚焦到外部的物质系统,更罔论针对系统的物质性展开研究。身处智媒时代,

上述传统范式已显露出与现实媒介环境的矛盾,普遍性与一致性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开始崩裂、脱出逻辑,学界亟需新的范式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提出的挑战。

(一)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之一:二元哲学观

二元系统是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最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仪式观”的提出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论证了传播是符号建构出的意义,而非仅是传播的动机与目的,在对“他者”的理解中,传播关系中的本体性与客体性显现,二元系统在凯瑞的勾勒中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符号与物质、精神与身体的基本图式,其框定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研究路径并产生了诸多影响。然而,随着媒介的跃进式发展,上述划分方式难以覆盖技术发展伴生的诸多新问题,暴露出理论适应的局限性,从而对智媒时代的理论迭代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主体、轻客体。这里涉及的“主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者”,其中既包括传者,也包括受众。传播学传统研究范式将人置于传播过程的核心位置,围绕着该核心,相继形成效果、受众、传者、传播过程的研究。既往的传播研究,从单向模式到双向模式,乃至互动模式,都将传受双方尽可能的分离,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传者—受者”间互为主体与客体的假设,打破了传统意识哲学中客体对客体的范式。究其本质,上述的研究范式在传播过程中将主客体间的关系进行了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这种主客体的二分范式是基于社会关系稳定、传播情境固化的大众传播时代,其并不能完全适应智媒时代裂变发展的传播环境。在这样的逻辑下,主体与客体的认知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位移,因而产生了主客体之间的再认识与再定义。“人”这一以贯之的绝对存在也因而受到了影响、迎来了挑战。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述的客体并非媒介本身,而是指在传播场域中的人机

关系。

其次,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符号、轻物质。符号作为信息的外在载体,是传播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它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中介与桥梁。传统传播学研究范式下的符号学,将介质看做是一种符号,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中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世界是符号的世界”,与人的经验交织的意义获取都将无法摆脱符号的命运。这种对于既有研究的先验,使得介质的物质性特点被弱化,文本本体论被放到首位,智媒时代,问题应运而生:过去人们用符号的意义阐释电视、广播、印刷,将媒介框定在符号的体系下进行研究,但是随着智媒对现实维度的不断干预,“媒介”是否与“符号”间产生了位移?传统传播学研究将符号本体论放在首位,以探讨其背后的过程、作用、价值,而智媒时代的符号生产是否还处于权力、关系及秩序的中心?这同样是对主体性的追问。

再者,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重精神、轻身体。“从来没有真正的大众传播学,只有真正的大众心理学。”^①20世纪20年代起步的大众传播学深受20世纪初心理学思潮的影响,这正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授意。前文所述的符号文本、利益构建、社会文化构建都聚焦于研究人与人之间、个体向内的意义,即重精神的过程,而这也与大众心理学的研究一脉相承。传播学既有研究用符号的体系去规范和建构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活动、互动过程,构建传播的意义并尝试打通共享。上述这些对于精神意义层次的推崇均是建立在人类的精神和身体始终共处一个时空,未曾发生分离的基础上,即时空是固定且稳态的。而在智媒的传播环境中,前述条件已不再绝对,人类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分属不同的时空,并各自产生意义和联结,身体可能成为技术的延伸,乃至系统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坚持对于身体的轻视与对精神的重视,似乎已经无法达成精神世界的意义建构与

身体感官间的平衡。

(二)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之二:一维时空观

时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和结构。从超验世界到经验世界,时间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所指,生发于人类长期实践的逻辑关系集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强大的观念力量,反作用于客观实在。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时间观念的改变与媒介技术的流变有着必然性,可以说,技术本身包含着它们自己的时间性。对于时间的认识,正是对于其所存在的时代的映射与反思,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现代性正是“流俗时间”的产物。既有的传播学研究范式,使用统一的时空范畴和共性的社会向量来规定特定条件下的传播认知,其所处的时空不可被分割、叠加、交织……传播研究被囿于单一的截面。然而在智媒时代,这个被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视作是“共鸣”灾难史的现代性当下,“时间上的消散是一种范式变换后的后果”^②。全新的传播媒介将我们裹挟进时间碎片化的夹缝中,使我们沉浸于即时和共时,全新的时间结构由此诞生,未来或可多个时空在线上、线下有序地叠加,实现多维时空的突破。

二、思考为何会有——一场由智媒引发的转换

前述建立起对于传统研究路径的基本认知——传播学传统研究范式多从人的内部关系出发,致力于解答主体如何用符号达成精神诉求与意义流动。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就智媒时代技术主体也获得了制造可供传播的内容的能力及其传播机制,引发有关人类与机器间、主体与客体的本体论分界模糊这一现状的讨论,从而进一步反思传播学既有研究范式的适应性。下文将从更多维的视角论述智媒时代为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怎样的路径、对范式迭代提出了何种要求、并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变化。

智媒引发的变化有哪些?简言之是系统的更新与升级,即由智媒主导的媒介系统代替由人类行为主导的传统传播系统。

传播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注重传播过程,即传播系统。既往媒介研究往往受困于社会科学“二元论”视角下的主客体分立,并由此形成了以效果研究为核心的媒介研究,与之相关的媒介研究聚焦于媒介所传递的特定信息对于个体乃至社会层面的影响,即与媒介勾连的多重关系。“媒介”(medium)这一概念自口语时代、印刷时代走向电子时代,常被视作是符号的“载体”与主客体间的“桥梁”,用以负载、传递特定的信息,从而具有“中介性”的意义和价值,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认为:“文明与承载它的媒介技术相互观照。媒介对文明的影响通过推进思想的实践和传承来达成,思想在传递装置内生产,储存于传递装置之中,并借助传递装置迁移。”然而这种“被客体化”的情景使得媒介长期处在传播研究边缘,难以获得真正的突破。我们时常为媒介纷扰的周遭所影响,而难以凝视其本身。与技术决定论一派不同,在内容与形式这一天平的两端,本研究不凌驾于任何一端,而是希冀寻找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

智媒时代的信息化社会致使媒介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研究中的“中介化角色”,而具有在社会结构中流动的去本质论的“媒介化转向”(turn of mediatization),“现代社会已然完全由媒介所‘浸透’(per-meated),以至于媒介再也不能被视为一种与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相分离的中立性要素”^③。媒介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工具”,而具有系统性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智媒时代的到来,既往传播系统的视角将难以继续框定媒介普遍现象,对于媒介系统的转向研究将成为必经之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媒介研究将去向何方?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认为“去二元论”乃至“去中心化”的媒介特质正是基于“用户”概念的不断延展与突破,用户不再只是使用媒介,而是切身生活在媒

介之中。其中映射出了以媒介为出发点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也因而出现了更多有关人所生存的系统的猜想,“媒介化社会”(mediatization of society)所指涉的媒介“入侵”甚至“替代”原有的公有与私有领域从而使以媒介为“中心”的社会机制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由此,我们将对于媒介的研究转向一种系统性的视角,以期探究智媒时代的媒介化生存图景。

媒介系统不同于简单的媒介研究,是将主体、信息、技术、场域以及关系这五要素融为一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其致力于完善既往研究中“二元论”视角下所遵循的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传统的“传递观”与“仪式观”是将传播视为物理层面的信息位移以及共同表征的维系,其一度被视作是传播行为的高度抽象,并主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传播研究。然而“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④。对于媒介系统的强调,可以修补过去的文化世界与客观技术世界之间的断裂,使两者间的崩坏处弥合,在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之间相互转换,打破原先一味寻求人类内部统一意义的传统线性思维,从而还原和重塑人们的价值意义和感官尺度,寻找到传播过程中价值意义和经验感知的平衡点。未来智媒时代的核心即用媒介系统代替传播系统,以图突破线性、一维的现象分析,以“去本质化”的感召对特定的历史变革做出积极的回应。

(一) 主体

智媒引发主体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种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⑤既往的传播研究在“二元论”的指导之下,往往创设出主客体分立乃至主客体对立的情景,在传播过程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分化常通过对于传播过程中传受角色的划分而确立,如前文所述,主体并不等同于传者,却时常被视作是“核心”,是传播活动开展个基点。主体的存在意味着传

播行为具有方向性与目的性,这正是稳定、固化的大众传播环境所形塑的。先验性的主体将传播活动的流向控制在既定权力的范畴内,并以此形成与客体之间的权力位移,从而服务于上层规范与框架。然而,在新的媒介传播环境下,暨关系网络的不断建构与解构中,主体及其依附的主体性不再由固定的本质所决定,流动性成为了智媒时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新面向,“在赛博人时代……真相的定义成为一个动态连续、多个主体的拼贴过程,其中自然有强势节点与弱势节点的区分,但专业垄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转移,并逐步瓦解了”^⑥,并由此引发关于“未来主体”可能性的不断探讨。与之伴生的,还包括主体范畴内“精神”与“身体”的再思考——意识主体与身体主体间的矛盾,传播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一脉相承,在与心理学等学科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学继承了“向内看”的路径,从而聚焦于对于个体乃至群体的“精神”研究,“身体”这一物质性的载体被“遮蔽”,甚至“克服”。如果说,每一次的技术跃进,都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言,是一种对于是身体感官的分割和重组,在不断逼促的技术流变中,精神与身体,或者说是意识与物质的对立,终于走向了一个临界点——赛博人(cyborg)的诞生,其将被大众媒介分隔的各类感官进行重组,乃至融合,也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智媒时代,主体内涵延展。主体的身份角色将不再囿于传受角色,一个个体上一秒也许还是传者,下一秒便能成为受众,甚至两种身份会在一个个体上实现同时空的叠加。传者和受众合并成“用户”;这一概念的出现呼应了“产消一体者”(prosumption),其最初由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于1980年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预示消费者将会被卷入传统的生产部门,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将会日益模糊,人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工种”,而是成为复合型的“产消者”,即新型用户。与此同时,“行动者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同样

揭示了实践框架中的受众,或者说“社会行动者”具有接收制约与反转结构的二重性,“其既不会被主观目的、信念、态度或情感所支配而成为绝对的理性自主个体,也不纯粹受制于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整体规范与结构而变得被动与无助”^⑦。在此基础之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开始向媒介系统节点转变,这并非先在的、固定的、单一的主体,而是在关系网络不断解构与建构中的动态呈现,关系网也因此成为“网络中的节点主体持续不断的实践编织起来的流动空间”^⑧,原先稳态的社会结构在多维时空的展开中衍生为多个子系统的并置。“用户”仿佛蚁穴中的工蚁,是一个巨型网络构架中的信息搬运工,亿万节点在同一媒介环境下,即在被稀释甚至消解权威的空间中平等对话,传播行为不再具有绝对的方向性,因而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分立,伴随着主体内涵的延展,新型主客体关系由此诞生。

其次,主体自身分离。“身体”作为人显现于世的介质,与世界同属于“构成性处境”,身体“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创造出一种关系和意义”^⑨。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的“身体—主体论”正是对理性主义“意识—主体论”的反叛,对于多重研究叙事中“身体”重现的呼唤,事实上,智媒时代的“身体”更进一步,不再囿于物质层面的存在。智媒创设的传播环境,使得“身体”的回归和超越成为可能。当植入人体的芯片以电子脉冲的形式进行数据交互与联结,甚至干预现实环境本身,传播实践不再集中于特定的时空,精神与身体在技术的介入之下分属于不同的时空,开始向多维时空平行延展,且在不同层级下拥有不同的特点,原先单一、固定的传播行为被日常化、碎片化的传播行为“渗透”。正如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图灵实验中发现的,“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间的互构,“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⑩。人

将身体“交付”于媒介,人的位置逐渐捉摸不透,甚至在媒介化环境中不断流动,罗泽指出,人至少拥有三个“身体”,“一是处在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中心,二是处在虚拟的通过屏幕看到的空间,三是处在另一个仍然‘真实’的、机器人占据中心的空间”^⑪。人的身体因而成为一种生物概念与技术中介的互嵌,赛博人由此诞生,与之一同到来的,是三种“在场”方式:留存己身、离开己身、进入他身,技术与身体的交织操控着个体的在场与离场,并不断重复上述过程。赛博人这一概念所揭示的,正是基于智媒环境技术流变所导致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⑫。

(二) 信息

在传播学研究既有范式中,以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例,传播的“传递观”将信息的传播过程视作是物理空间的位移活动,信息被视作是符号搬运的载体,且具有从主体向客体流动这一特质,即我们在前文所述的传播活动的方向性与目的性,这种在空间内流动的特质服务于破除空间的统治目的,一定程度上与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传播偏向论中的“空间偏向”遥相呼应;而传播“仪式观”则更近似于一种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比起空间中的位移这一传播过程,更强调时间维度中对社会共同信仰体系及社会本身的建构过程,目的在于对于特定观念的描述与强化。在信息流动的过程中,介质作为具有先验性的符号文本,被视作是社会文本与文化意义的象征。“对信息的采用某种程度反向改变了既定的社会机制框架”,被视作是“技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过程”^⑬。在既定视角下,用符号文本规定显示世界与官能感受,符号的意义存在于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而并非符号系统本身,与之相关联的研究也更多聚焦于对于符号意义的解读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性研究,符号始终没有脱离其载体与环境,“这使人类的探究过程转变为,带有现实意涵的交流与传播活动”^⑭。

首先,智媒时代,信息逻辑的改变带来主体认知的重构。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营造出全新的传播环境,时下的“环境界”即随之演变出的媒介系统,重在破除线性、一维的认知,重塑官能感受,打破以往大众传播的固定性,从而破除既往重精神、重符号的研究范式,创设新时代符号发展的可能性。符号成为介质上流动的物质,介质成为符号的载体。当代符号学在对于新情况的不断应激中,也在更深层次打通“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与“总体传播学”(global communication)间的内在联系,“新符号学运动”(new semiotics)带来研究视角的转变,也一定程度上与智媒时代的信息发展趋势拟合,“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与“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等新兴的分支方向在继承前述研究精华的基础上,不仅着眼于探究符号的传播和交流,更将研究对象从既往的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传播,“转向人与环境界的符号传播,乃至整个生命界的符号传播”^⑮。介质上流动的不再只是符号,而是复杂的信息集合体,包括但不限于:感情、权力、关系等,用户在现实世界消解的要素得以在虚拟环境中“重生”。随着要素的不断流动与迭代,多个领域与社群的破壁沟通成为可能,有赖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未来将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潜意识层面研究,对于符号与其认知主体间的互动进一步延展,这正是介质的智能化与物质化转向所产生的某种必然结果。

其次,智媒时代,信息逻辑的改变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构。“当传播信息成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时候,传播系统就变成了超社会系统或元社会系统”^⑯,信息基础设施兼顾了人与物的双重面向,“新科技集群以算法优化和基因编码为基本框架,正在对生命的本质和人的意义进行‘技术的定义’,客观上消解着轴心时代奠定的价值和意义”^⑰。有关符号及其意义生成的惯性正经受着技术流变的不断考验,媒介时空的碎片化意味着意义形塑的断点,意义也因而难以获得既往时空特质下的维护与统一,而不得不

面临新科技集群之下的“第三次跨越”。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为代表的符号学“第一次跨越”发现了意义生成的基本规律与泛化的学科规范;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的符号学“第二次跨越”将符号学引入大众文化研究,从而获得了来自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如今的“第三次跨越”正是新的技术环境下信仰重建的必由之路,当代符号学或将产生总体转向,“符号学思想呈现出开放、动态的整体特性,进而超越结构主义,持续引领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方向”^⑱。

由此伴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共同的介质来达成某种统一?或是可以在个性化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之中创造己身的意义?此时的介质拥有自己的属性和底层逻辑,生发于特定的技术环境,无法被先验。如此经验性的物质流动,无法用过去被框定的文化意义去规定,因而具有了基于智媒技术流变的全新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几乎所有异质物,包括生物体和非生物体通过信息中介实现跨界物质之间的交互,从而建构起一种人、机器和环境普遍交互的可能。因此,信息、控制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⑲。在算法推荐的惯性中,在信息将一切转化为数据与符号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预言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已经照进现实,成为不容忽视的“日常”。

(三)技术

在智媒时代多样化的技术表征之下,横亘的是长久以来关于人与技术间关系的无尽追问。“技术论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前者用技术方法‘中立地’剖析技术,后者用人文眼光批判地审视技术。”^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技术与科学分立,指出“科学是知识与概念本身,而技术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集约”。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与生活的联系加深,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编撰的《百科全书》中将技术定义为:“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目标而协作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完整体系。”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技术工具学将技术视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对于技术的使用是基于某个或是某些特定的前提。

20世纪兴起的经典技术哲学(class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开辟了技术研究的新进路,海德格尔作为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反对技术工具学的论断并提出“技术是先于人而存在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驾”(Ge-stell),而“存在”(being)是技术这一“座驾”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驾”是人存在的前提,围绕技术条件与技术环境生成的文化与制度,与“人”存在的前提互嵌,因而不能将人与技术进行简单对象化的主客二元论。从遮蔽(letheia)到去蔽(A-letheia)的过程,正是真理展现的形式,也是技术的来由。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将技术存在的问题与人本问题相结合,强调心灵决定技术,技术起源于人内,并以此将技术分为生活中心(life-centered)以及生产中心(production-centered)两种本位。在此基础之上,将对于巨物及其映射出的严密组织的抵抗转化到己身理论的建构中,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巨技术”(megatechnics),现代技术对于有机世界的系统性背离表现为“巨机器”(megamachine),可以视作是权力与控制的化身。

“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在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和伦理转向(ethical turn)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②,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经验转向与21世纪初的第二次经验转向分别将技术哲学研究引向了实用主义与工程研究的进路,现代技术哲学应运而生。

首先,智媒时代的技术转向,使得环境信息增量加剧,人与技术的融合度增加,“必须更加彻底地重新思考人、技术和语言之间最初形成

的纽结……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②。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其越发深入地介入微观的个体生活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显在的社会经验,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也愈发模糊,技术超越了对于外在环境的干涉,而开始“进入”人体,一种由技术与身体交叠的跨界装置诞生,“技术开始吸纳身体,促使人机关系进入普遍化的人机互嵌、人机合一状态,促进生物态的人进化为人机融合装置”^③。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是人的延伸”后,或将出现“人是媒介的延伸”这一协同进化的图景,“数据爆炸之下的人正在变成机器,掌握巨量数据的机器正在变成人”^④。从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直至电子时代,媒介从显在基本官能的延伸,走向神经系统的联结,这种共在信息系统构成的必然性,正是在技术递归中,走向与人体的互构,“形成人—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⑤。

其次,智媒时代的技术转向,为“技术”的“去工具性”创设了条件,“技术规定着技术时代的人按照技术的方式去活动,而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本质却茫然无知。技术越是支配着人的活动,则技术的本质就越是陷入被遗忘状态”^⑥。对于技术的工具性认知将技术对于现实的指涉限定在内容的反馈上,这也是“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技术—以贯之的视而不见,工具论(instrumental)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技术的基本维度,却无法“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面临着来自智媒技术流变的必然。“智媒”所指涉的技术“集合体”是包含了技术、原理、机能、产品等要素的综合性系统,并且随着其与现实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这个“巨技术”的边界仍在不断延展,或者说,技术边界的扩张自诞生之日起从未停止,只是伴随迭代的速度存在扩张效率的高低。智媒源于技术又超越技术,其在信息生产的基础上,成为一种“围绕着它所依托的介质和载体所产生的组织性、结构性的活动,重新结构社会性的生产关系”^⑦。技术的自生产意义不仅是扩展了

社会再生产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基于此的人类经验的延展,“作为工具的技术只是节省了劳动,而作为装置的技术则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②。

(四)场域

“时空”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相互指涉、相互勾连、相互影响。在智媒技术具身化的背景下,时间与空间会在节点上交汇并置。值得注意的是,单一节点上可能存在多维时空的重叠与并行,网状节点中,时空要素可以转移,甚至复制。以人的节点为例,当人同时置身于不同的软件之中,在其身上实现了时空的“共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还可能出现“灵肉分离”,即身体与精神分属不同时空的存在方式。这启示我们有关时空分割的多种可能性。“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③,在对于时间、时空的认知中,现代人的存在被界定与规范,“人从‘当下即是’的‘即时即地性’中连根拔起,从固定在‘地方’上的存在变为‘位移’,成为界面之中的轨迹”^④。

当我们谈论智媒时代的“时空变化”,不可规避的就是对于媒介系统的要素之一——场域的认知。“场域”(field)的前身是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场论”,勒温将其理解为是一种研究方法,并赋予其元理论的地位。在勒温将场论确立为元理论的过程中,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做出重大贡献。布迪厄基于对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贯通,提出“场域”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⑤,场域与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先决条件,场域之中包含着基于空间及其规则的争夺与占有。布迪厄曾将场域理论与传播学研究结合,提出了媒介场、电视场等概念,并将其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相关联。尼克·库尔德利在场域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媒介视作是一种“元资本”,可以负载权力的流动与发出,某种程度上,媒介元资本“是一种

整个社会空间的定义性权力”,在社会整体媒介化的趋势之下,“媒介对一切场域都形成强大的他律”^⑥。迅猛发展的智媒正在构造全新的场域及其相对关系,主体在特定场域中拥有的“惯习”,同样在建构着既定的场域,这种基于社会空间的隐喻,已经呈现出开放的关系取向。

时至今日,在场域的不断流动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被视作是一种后现代条件之下不可阻挡的时空维度变化趋势,瞬时性、碎片化的时间成为其不可避免的产物之一,与之类似的是罗萨的“社会加速”(beschleunigung)理论,强调时间对人的规训:工业时代的整体性时间转变为信息时代碎片化时间,这一过程切实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方式。社会加速的过程,往往以三个维度呈现:技术加速、社会加速、生活加速,这三者间具有互构性。而“加速社会”的形成,正是指社会节奏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其加速速度的本身,从而将多层次、多维度的要素卷入。由社会加速引出的“物向存在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正是对于“媒介化时间”的审视,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与使用面临着“媒介化”转向,在显性的社会加速背景下,潜藏的正是媒介时间性的“存在处境”,其从稳态的源始(primordial)时间走向公共性的流俗(vulgar)时间,“客观的、物理性的时间,就与心灵和精神上的广延挂钩了”,技术与算法在当代的媒介化转向中共同织就出一种“无时间之时间”的虚拟时间,或者说正是“场域”。

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提出,时间和空间不仅不存在尽头,而且是可以被无限分割和无限延展的。多维延展的时空向度作为一个进行时,使精神与身体分离、意义与感知分离,同步性与异步性交织的媒介时空塑造出体量庞大的信息媒介景观。传统传播研究范式构筑起的文化世界在未来的感知世界中发生分离,且分离的可能性、精细度都在随着技术的迭代与嬗变而与日俱增。人们逐渐进入以碎

片化、圈层化、场景化为特征的不同传播时空,甚至在同一时空面临多角色、多关系、多任务、多情景相互交织下的复杂场域,在这里,真实与虚拟交织、延伸与压缩并存,逐渐形成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论述的“流动的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的时空观念。“当空间可以成为流动性的、地域空间可以发生位移,那么时间只是一个相对存在的概念,甚至可以消失。”^③智媒时代对于时空的重塑意味着社会基础运行逻辑的再造与研究范式的迭代,面对共时性的疾驰,拥抱或是“凝思”,一切尚是开始。

(五)关系

前文论述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将主体指涉为参与传播活动的人,其中包括传者与受者等角色。那么随之伴生的,即客体,也是本文中的研究重点——媒介场域当中的人机关系,而非媒介本身。这正是对既往传播研究“客体化”甚至“实体化”取向的再讨论,实体化的媒介观一度使媒介“矮化为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元素”,伴随着“去差异化”认知带来的是“传播学将媒介仅仅视为器具、工具的固有思想……最终留下的是用处、效应,媒介却消失不见”^④。既往客体的定义及其研究已经无法支撑新技术环境之下的跃进,本文借由对于客体的再定义,引出我们这个部分论述的主旨——人机关系(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及其区隔和联系。人机关系的诞生正是基于智媒环境中技术的不断迭代而产生出的机器进化的新进阶,在技术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它陡然转向,回到了人本身。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延展其突触,但却并非如同先前在物理层面的“开疆拓土”,而是来到了精神维度的意识层面,个性化与多模态的高维信息服务,使得技术一定程度上超越外在环境而与身体跨界融合,其角色关系正逐渐超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让渡给“人机关系”这一新兴主题。由此引发的,正是“后人类时代”(posthuman time beings)的席卷而来。随着对于传播过程中主体的调

校,如上述提及的内涵延展与自身分离,甚至于“赛博人”的诞生,智媒借由对主体的影响,事实上,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进行了切合新传播环境特点的调校。或者说,智媒时代的客体及其可能性正蕴含在技术与人的“终极的媒介”——主体之中。

传播学既往研究的传统范式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这正呼应“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被视作是一个由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媒介与其传播行为被视作是维护社会运作的工具,服务于子系统之间的功能交换。“媒介技术被视为是传播的手段、工具和平台。”^⑤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构媒介”的讨论被唤起,近年来的“媒介化转向”(turn of mediatization)正是基于媒介高度介入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结构这一现状,从而产生了“去中介化”转向,媒介不再是一种与社会及文化高度分离的要素,而成了介入性的“元资本”本身。基于这种媒介化转向展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的理论建构、中观的机制研究以及微观的交往行为考察。平行于上述三种划分维度对“媒介化”进行定义的,还有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提出的三种敏化概念: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ation);技术动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嵌入式传播(embedded communication)。上述媒介化转向这一议题,启示了媒介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态势贯穿社会与“日常”,与既往“被客体化”的媒介不同,智媒环境蕴含的技术“座驾”将更多的可能性蕴藏在与媒介相勾连的各式关系中。“智媒传播中的人机融合正在成为智能化网络社会中一个‘终极的媒介’,它作为智媒时代传播网络中的基本节点,以动态、持续、渗透性的实践方式嵌入日常生活。”^⑥

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中的身体》中将身体划分为三个类别:包括此在化的、作为经验存在的肉身身体,即“实在身体”;具有性别、种族、身份等多重社会属性的“社会身体”;被

不断扩张并跨越边界的技术“具身”的“技术身体”,三个身体的状态可以“共在”,并且具有继承性和延展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智媒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身体”或将颠覆“实体身体”与“社会身体”的存在方式,并逐渐先验化。“媒介物与身体的交互与沟通取决于技术的可供性、人的媒介需求、使用习惯,以及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媒介物与身体合为一体会呈现权力关系与权利关系。”^⑤身体,将会成为现实世界接入虚拟世界的“接口”、一个可供交互的操作界面。这种节点主体所表征出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信息系统,而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子系统并置,从而将“人机关系”这一客体映射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包括但不限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多维时间与异质空间等等,这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⑥。智媒时代,技术开始吸纳主体,主客关系走向新进路,“后人类”的猜想逐渐成为现实,人机关系走向互嵌与融合。现代技术中不断流变的技术与媒介形式,不断分割、重组着人及其意义本身。在人的主体性与机器效率之中,达成两者的平衡与协同进化,或将成为永恒的追问。

三、思考去向何方——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智媒时代的技术流变,对当下的传播环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播学作为一门与现实环境高度勾连的学科,在技术迭代中迎来了必然性的道路选择。凯文·凯利(Kevin Kelly)将这种范式转换导致的巨大影响概括为:“古登堡使得科学与律法从印刷中诞生,我们成了书籍之民;今天,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成了屏幕之民。”如其所述,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从“二元论”的历史图景中展望,技术与媒介作为工具性的“中介物”,长期面临边缘化的处境,“传播研究将实体和它的影子割裂开来”,对于“物质性”的反思与重提给予

了该学科一个可能性的答案,其将裂变性的技术逻辑植入传播学先验观念与现实经验的间隙中,以此探求传播学的范式更替的进路,而这一切或早已深埋在历史的“预言”中。

(一)具身性

主体作为研究的“核心”与落脚点,决定着研究的基底与走向,而“人”作为传播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主体,在智媒时代的技术跃进下迎来了新的转向——“人机融合”,由此启发我们对于主体及其存在的再思考。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曾在其著作《对空言说》中反问:“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传播学研究中身体缺位所映射出的观念,与现代性的主体观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互动。西方文化思想传统中自苏格拉底时期兴起的“灵魂—肉体二分法”(soul-body dichotomy),发展到近代形成了“机械身体论”(automatism),在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不断论辩中迎来了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观”,这种由中介向核心的认知转化被部分学者概括为“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显现为在场之物的重要媒介……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桥梁”^⑦，“身体—主体论申明了身体在场的重要性,指出大众媒介突出理性意识远程在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危险与弊端。身体—主体论也成为重新理解传播、媒介的重要途径”^⑧。

或许正如麦克卢汉常被前半句的光辉所遮蔽的后半句一样,“媒介是人的延伸,延伸意味着截除”,在赛博格隐喻中的被机器替换掉的器官,或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基于官能感受的身体观照。“如何感知身体和身体的运动,是我们认知所处空间经验的纽带。”^⑨后现象学的技术思想认为:“每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存在论的模式。技术转化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我们的知觉和我们对世界的解释,而反过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转化了。”^⑩这正是对于“身体”的“拾起”,当

我们基于上述对于既有传播范式的回溯并展望之时,我们应该看到,“身体”已经从与内部心灵无休止的纠缠中越出,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乃至历史交织在了一起。

(二) 经验性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通过对“先验”(transzendental)、“经验”(empirisch)、“超验”(transzendent)的辨析,为我们揭示了在认知层面某些概念与范畴如何被时空向度介入,从而形成多维延展的认知与境况。“经验”作为一个相对稳态的基准,将“先验”与“超验”框定在“超越”与“凌驾”的理念中。在“先验”与“超验”的比对中,“物”的概念或将延展。

客观实在性一定程度上与“经验”挂钩,经验所具有的天然的物质属性,正是来源于客观世界物质性流动的折射。作为经验的传播不同于走向先验的传播,后者将事物中的经验性条件剥离,并塑造出同质化的感知,从而使人们被普遍性且缺乏异质性的规则限制,在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中远离自身来源的“日常”,简言之,符号“真空”中的塑造与传递,正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行为。人们被特定的“共在”统摄,失去差异化的落脚点。而作为经验的传播将现实世界归为一种社会实在,而非由符号建构的悬置在半空的“切面”,具有真实可感的特点,传播行为流动在其中,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这种元概念“基础设施转向”与“物质性转向”间存在着必然性,“它是由一系列中心、节点、线路和终端构成的网络,构成了人类行动的物质条件,形塑了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④,并嵌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将传播的物质性视为是一种具有施为性特征的经验流动,具有把“潜在”转化为“实在”的物质性力量,能够通过对社会系统中生产要素的协调从而在现实的传播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社会再生产。智媒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传播这一要素在社会系统中的全新使命,作为经验的传播,“促进了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之间的

相互转化”^④,传播这一行为得以在社会经验的流动中对现实层面进行调度、延伸和转换。

(三) 互动性

伴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互动”行为的主客体间也产生了变革。智媒时代,伴随社交媒体所产生的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既往大众传播的环境特点,重塑了交往行为与社会关系。大众传播时代的“在场”,更多依赖于“重符号、重精神”这一范式所营造出来的主观想象而浸入;智媒时代,技术以更加切近的方式“成为人”,甚至“超越人”,虚拟环境的“在场”,立足于感官的交互与实践。唐·伊德(Don Ihde)提出的“人与技术的多重面向”超越了主客二元论,认为两者在交融与共生中相互影响,人与技术的关系进一步迭代为身体与媒介的“意向”(intentionality)关系,既往社会互动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传播环境需求,在人的具身技术与媒介的物质性转向的合力中,主客体“平等”的互动框架为所谓“互动面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伴随着“人机融合”与“人机共生”的降临,人与“媒介化社会”乃至人内小环境也在发生着互动,甚至博弈,脑机交互的技术手段不仅在虚拟空间控制意识与身体的知觉,并将现实世界的生理身体纳入“同步”,形成“共谋”,“人类在身体、媒介及环境相互交织的‘具身互动’中生成新的自我形态”^⑤,人机互动已经成为必然性的未来。进化论的视角启示我们人类向“后人类”(posthuman)转变的必由之路,身体在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衍生出多种图式(body-schema),以适应不同的外置情景,从而将交互的行为由人内流向人外,并辐射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甚至技术环境,形成一种交互的循环,人因而获得了多种意义上能力的延展与意义的扩张。

四、结语

21世纪初西方学界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materialism turn)雏形初现,对于传播系统

及其基础设施的历史回望,不禁让人反思“赛博空间”是否是下一个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脱离了现象学层面的存在,从而使真正的关系被遮蔽”^④。以“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为首的物质性研究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于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划分,将“物”(object)视为一种可供行动者。事实上,该转向并非闭合的研究领域,而处在长期开放的定义状态下。“物质性转向”看似泛化的研

究内容或将启迪我们,该领域的贯通与联结正是破解既往非此即彼观念的一种可能。从海德格尔到德勒兹(Deleuze),从 STS 走向 ANT,以物为基础的哲学研究,走向存在、走向身体、走向中心……这启迪我们,物质性研究及其进路或将成为引领下一次媒介研究浪潮的第一滴水。这启示我们从具身性、经验性与互动性出发,探讨一种可供性(affordance)的未来。

【责任编辑:潘可武】

注释:

- ① 胡翼青:《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38-51页。
- ② [德]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太、徐基太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 ③ Hjarvard, S.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vol. 29, no. 2, 2008. pp. 105-134.
- ④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 ⑤ 陈卫星:《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8-14页。
- ⑥⑩⑪ 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第4-11页。
- ⑦ 顾洁:《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框架、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32页。
- ⑧⑫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第83-103页。
- ⑨⑬ 欧阳灿灿:《“无我的身体”:赛博格身体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0-66页。
- ⑩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 ⑪ [美]弗罗里安·罗泽:《第二个和第三个身体,或者:成为一只蝙蝠或住在另一个星球上会是什么情景?》,载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 ⑬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47-156页。
- ⑭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 ⑮ [意]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王永祥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21页。
- ⑯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7-46页。
- ⑰ 李思屈、臧金英:《第三次跨越:高科技背景下的传播符号学》,《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56-63页。
- ⑱ 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第87-104页。
- ⑲⑳㉑ 别君华:《智媒传播中的人机融合关系及其实践维度》,《现代传播》,2019年第11期,第32-36页。
- ㉒ 刘永谋:《媒介技术与文化变迁:尼尔·波兹曼论技术》,《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29-34页。
- ㉓ 潘恩荣:《技术哲学的两种经验转向及其问题》,《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98-105页。
- ㉔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 ㉕ 吕尚彬、黄荣:《智能技术“域定”传媒的三重境界:未来世界传播图景展望》,《现代传播》,2018年第11期,第37-45页。
- ㉖⑳ [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8页。
- ㉗ 吴国盛:《海德格的技术之思》,《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第33-40页。
- ㉘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122页。
- ㉙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 ㉚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王庆节、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4页。
- ㉛ 卓承芳、胡大平:《存在与速度——维希留与社会批判理论本体论视域的深化》,《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第22-30页。
- ㉜ [法]皮埃乐·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 ㉝ 胡翼青、王聪:《超越“框架”与“场域”:媒介化社会的新闻生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38-144页。
- ㉞ 姜楠:《媒介变革对时空观念的重塑与再造——一种媒介时空观的历史视角》,《新闻世界》,2018年第9期,第80-83页。
- ㉟ [德]杰弗里·温斯洛普-扬:《基特勒论媒介》,张昱辰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 ㊱㊲ 杜丹:《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第18-34页。
- ㊳ 周逵:《沉浸式传播中的身体经验:以虚拟现实游戏的玩家研究为例》,《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5期,第6-26页。
- ㊴ 张磊、贾文斌:《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元概念、路径与理论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22-32页。
- ㊵ 吕清远:《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70-79页。
- ㊶ 殷乐、高慧敏:《具身互动:智能传播时代人机关系的一种经验性诠释》,《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1期,第28-36页。
- ㊷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103-115页。

(作者徐轶璞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那宇奇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